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经济联系

王春萌 杨珍 谷人旭¹

【摘要】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服务业的相关数据,采用产值密度、产业专业化系数、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测度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并通过服务业与外界经济活动密切交流产生的城市流强度考察城市间经济联系。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的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现,形成“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宁波-舟山”的“Z”形走廊地带;服务业分工专业化程度提高,空间分工愈加明确;各城市服务业优势行业出现变化,但存在一定的产业同构现象,未来要打破行政壁垒,着力培育新发展方向,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各城市均具有一定的外向辐射能力,但差异较大,要通过发挥高城市流强度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实施产业转移、促进服务业有效集聚、强化交通网络建设等措施,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

【关键词】 服务业 空间分工 经济联系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8)12-0148-08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表现出“经济的服务化”和“服务的知识化”特征、服务业已成为城市发展重要引擎的背景下^[1],服务业的空间分工及其经济联系对城市经济增长、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城市功能提升及全球城市崛起产生积极影响^[2]。Taylor et al. (2013)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多集中在大都市区域,相较其他服务业部门表现出更明显的空间集中特征^[3]。Wu et al. (2016)以上海市商业服务业数据为基础,发现信息技术集聚对商业服务业空间分布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越靠近信息技术资源,越有利于商业服务业及时准确地收集和掌握信息^[4]。在中国不同区域,尤其是大城市内部,服务业的空间分工成为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5]。从城市内部空间出发,无论是研究东部地区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还是中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如武汉、长沙、南昌),都有同样的证据显示服务业整体或内部各行业均存在较明显的多样化分工特征^[6,7]。

自 20 世纪 50、60 年代,城市逐渐兴起,经济联系主要反映在城市间联系、商品流联系及中心地联系。到 70 年代,新地区和小社区的发展推动对产业联系、公司联系及扩散联系的关注。进入 80、90 年代后,服务业和大都市区迅速发展,使得等级联系、相互作用联系成为经济联系的重要内容,主要采用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后的引力模型、赖利模型、康弗斯模型、潜力模型、威尔逊模型、经济相互作用模型、城市流模型等进行反映。国内对经济联系的考察主要有企业联系、经济联系方向、经济联系强度、交通运输联系、区域经济联系及空间相互作用、区域空间格局及网络等方面,如孙久文等(2016)在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基础上,利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定量测度京津冀地区 13 个城市的空间经济联系强度,并据此划分出四个层级^[8]。而有关服务业与外界经济活动密切交流产生经济联系的研究并不多。

从《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颁布,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后简称长三角城市群)的关注度与日俱增,尤其是曾处于泛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安徽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但相比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的传统意义的长三角经济圈,安徽省内城市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与长三角经济圈内城市的空间分工与经济联系较

¹**作者简介:** 王春萌,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企业地理与区域经济;(山东济南 250103);杨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山东济南 250103);谷人旭,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企业空间组织与管理。(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山东实施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7CQRJ02);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重大招标项目“新常态下山东省情特别是以优势补短板的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016ZDZ001)。

为薄弱,相关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基于此,本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成的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进行研究,明确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由服务业推动的城市联系强度,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为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协同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参考。

二、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2016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指出长三角城市群包含上海,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面积为 21.2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2.2%;人口约 1.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1.0%;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14.87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9.98%。

本文所采用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根据国家统计局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为便于统一服务业口径及范围,明确第三产业即为服务业,所以本论文选择的服务业细分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14 类。其中,除产值密度采用产值数据外,其余方法均选择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从业人员数量进行测算。

(二)研究方法

1. 产值密度。专业化分工与地理集中度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产业集中在空间中的特殊表现,是产业活动空间上的分离过程,若某些行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水平特别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该地区的专业化特征明显^[9],所以选择服务业产值密度(D_i)来反映特定城市服务业在空间内的集中程度和分布特征,进而展现空间分工情况。计算公式为:

$$D_i = G_i / S_i \quad (1)$$

式(1)中, G_i 为*i*城市服务业总产值(亿元), S_i 为*i*城市的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2. 产业专业化系数。产业专业化系数也被称为 Krugman 修正指数,由 Krugman 专业化指数除以 2 获得,主要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个空间经济的地区专业化特征^[10]。

$$CS_i = \frac{1}{2} \sum_j \left| \frac{x_{ij}}{x_i} - \frac{x_j^*}{x} \right| \quad (2)$$

式(2)中, CS_i 为*i*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系数,其中, x_{ij} 为*i*城市*j*行业的产值或就业量, x_i 为*i*城市的总产值或总就业量, x_j^* 为城市群*j*行业的总产值或总就业量, x 为城市群的总产值或总就业量。 CS_i 的取值范围在[0, 1]间,其值越大,产业的空间分布越集中,各城市的专业化越明显;反之则产业的空间分布越分散,各城市的专业化程度与城市群平均水平越接近^[11]。

3. 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即区位熵,也被称为专门化率,其通过衡量地区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集中程度

来反映产业的相对发展水平、优势行业的地区分布及产业的区域专业化生产状况,进而揭示区域分工的基本格局^[12]。其计算公式如下:

$$LQ_{ij} = \frac{G_{ij}/G_i}{G_j/G} \quad (3)$$

式(3)中, G_{ij} 为*i*城市*j*行业从业人员数量, G_i 为*i*城市从业人员总量; G_j 为城市群*j*行业从业人员数量, G 为城市群从业人员总量。若 $LQ_{ij}>1$,则说明*j*行业为*i*城市的优势产业;若 $LQ_{ij}<1$,则说明*j*行业在*i*城市不具有优势, LQ_{ij} 值越大,说明*i*城市*j*行业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13]。

4. 城市流强度。城市流强度是指区域内城市间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和城市外向性功能(集聚、扩散)的影响程度,是衡量城市与外界地区联系密切程度的重要指标^[14]。城市流强度*F*的计算公式为:

$$F=N*E \quad (4)$$

式(4)中, N 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E 为城市外向功能量,其主要衡量标准为具有外向服务功能部门的区位熵^[15],见公式(3)。若 $LQ_{ij}>1$,则*i*城市*j*行业具有外向功能, $E>0$ 。若 $LQ_{ij}<1$,则该部门不具有外向功能, $E=0$ 。其计算公式为:

$$E_{ij}=G_{ij}-G_i*(G_j/G) \quad (5)$$

字母各项含义同公式(3)。

$$i \text{ 城市外向功能总量 }; E_i = \sum_{j=1}^m E_{ij} \quad (6)$$

$$i \text{ 城市的功能效率 }; N_i = GDP_i/G_i \quad (7)$$

在此基础上,得到*i*城市的城市流强度:

$$F_i = N_i * E_i = (GDP_i/G_i) * E_i = GDP_i * E_i / G_i = GDP_i * (E_i / G_i) = GDP_i * K_i \quad (8)$$

式(8)中, K_i 被称为城市流倾向度,反映了*i*城市所有部门外向功能总量占城市群总功能量的比例,即*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16]。

三、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

(一)服务业空间分工的演化效应

2011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服务业产值密度范围为[0.0159, 1.7574]亿元/ km^2 ,服务业在空间内主要集中分布在“沪苏锡”沿线地区,而浙江省内仅有杭州、宁波、嘉兴、舟山的服务业产值密度超过 0.3 亿元/ km^2 ,安徽省内所有城市的服务业产值密度均低于 0.3 亿元/ km^2 。2016 年,服务业产值密度处于[0.0314, 3.1012]亿元/ km^2 之间,相比 2011 年,最大值、最小值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空间分工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以上海为核心的服务业空间集中区域向外进一步扩展。江苏省内主要沿“苏锡常”向西北方向(南京)延伸,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现,从服务业基础较好的苏南地区展开对苏中地区的辐射影响,苏南大部分城市的服务业产值密度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同时苏中地区的扬州、泰州、南通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浙江省内主要沿西南方向(嘉兴、杭州)进行延伸,沿线的绍兴、金华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安徽省内服务业主要围绕合肥进行空间布局,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的服务业产值密度高于省内其他城市,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的产值密度虽有提高,但变化幅度均低于 0.02。苏南、苏中的产值密度普遍高于浙北、安徽省会及周边地区,加上前面的分析可以说明在 2011-2016 年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水平在提高,但苏南、苏中地区空间分工水平提高程度明显快于浙北、安徽省会及周边地区。整体上,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布形成“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宁波-舟山”的“Z”形走廊地带。2011-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带来的演化效应,直接推动服务业经济的增长,产值密度的提升呈现向核心地区集中,并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的趋势。

(二)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

按照 $0 < CS_i < 0.2$ 、 $0.2 \leq CS_i < 0.3$ 、 $0.3 \leq CS_i < 1$ 作为划分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低、中、高的依据,可以发现 2011 年,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 16 个城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南通、盐城、扬州、芜湖、马鞍山、铜陵、滁州、池州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居中,合计 8 个城市,只有安庆、宣城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到 2016 年,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低、中、高的城市数量变化为 6 个、10 个、10 个。从变化幅度看,有 23 个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系数提高,苏州、扬州、宣城 3 个城市的产业专业化系数降低(图 1)。整体上,由 2011 年产业专业化系数平均值 0.198 上升为 2016 年的 0.272,虽然上升幅度不大,但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由较低水平发展为居中水平,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愈加明确。同时,根据各城市产业专业化系数值,能够较准确地看出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苏北、浙中及安徽省内的大部分地区,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省会城市或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由此可以得出“在一定程度下,规模较大城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水平较低;规模较小城市的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水平较高”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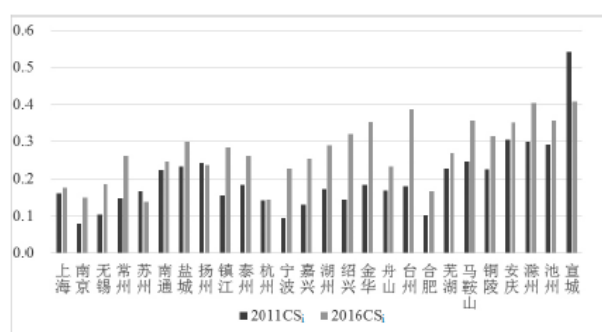


图 1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专业化系数变化 (2011-2016 年)

(三)服务业空间分工基本格局

2011、2014、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各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平均值依次为 0.920、0.964、0.998,虽未超过 1,但逐年提升。具体来看,2011-2016 年,除上海、杭州、宁波、宣城 4 个城市外,其余城市的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均表现为上升趋势,上升幅度超过 0.15 的有常州、盐城、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图 2)。其中,江苏省内城市的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值均提高,浙江、安徽省内城市既有提高也有降低,以提高为主,说明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水平在提高。在所考察的 14 个服

务业行业中,2016 年,上海、无锡、杭州、合肥各有 8 个行业的 $LQ_{ij}>1$,处于第一层次,集中在直辖市、江苏省内的经济发达城市和浙江、安徽的省会城市,其次是常州、苏州、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安庆、池州等城市有 6-7 个行业的 $LQ_{ij}>1$,处于第二层次,涵盖了江苏、浙江大部分城市,其余 9 个城市普遍有小于等于 5 个行业的 $LQ_{ij}>1$,处于第三层次,其中第三层次中超过一半的城市位于安徽省内。以上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江苏、浙江省内的城市服务业相对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安徽除合肥、安庆等经济较好的城市外,其余城市的服务业相对专业化水平较低。相比 2011 年,2016 年大部分城市服务业的行业数量增加,增加较明显的有常州、扬州、泰州、嘉兴、合肥、安庆,除常州增加 3 个外其余各增加了 2 个,只有上海、南京、宁波、芜湖、铜陵的数量减少,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省会城市及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苏州、金华、舟山、台州、马鞍山、池州 6 个城市服务业各行业 $LQ_{ij}>1$ 的数量没有发生变化,除此之外,其余城市普遍增加 1 个。这说明此期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服务业的优势行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化,行业发展表现为差异化态势,城市群内的服务业空间分工愈加明确。

2016 年,有 22 个城市将金融业作为优势行业;18 个城市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作为优势行业;24 个城市将教育作为优势行业;23 个城市将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作为优势行业;23 个城市将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作为优势行业,说明生活性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多个城市的重点行业,但生产性服务业在各城市的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针对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分析,上海除金融业外,其余 5 个行业均为优势行业。南京前两项和最后一项为优势行业。无锡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为优势行业。苏州、镇江、嘉兴、铜陵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的 LQ_{ij} 值较高。常州、南通的金融业较为发达。泰州、芜湖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优势较为明显。杭州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及宁波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具有明显优势;在生产性服务业中,常州、南通、盐城、扬州、湖州、绍兴、金华、台州、马鞍山、安庆、滁州、池州、宣城只有金融业的值较高。舟山只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 LQ_{ij} 值较高。合肥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具有一定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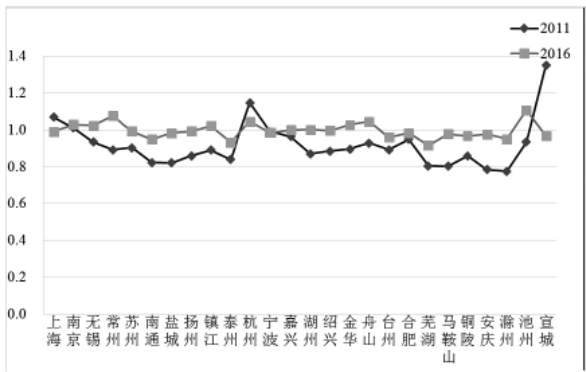


图 2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指数变化情况 (2011-2016 年)

除以上列举的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外的其他服务业在各城市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只有上海、舟山将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作为优势行业。在以上两个城市基础上,在住宿餐饮业上具有优势的城市增加了无锡、常州、苏州。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大部分城市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发展较好。

四、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经济联系

根据公式 (3) 已经计算得出各城市服务业中的行业,这些行业的外向功能为 0, 然后按照公式 (4)-(8) 计算出各城市 2016 年的外向功能总量、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及城市流倾向度 (表 1)。根据表 1 可知,各城市均有一定的外向功能量,说明各城市均具备一定的向外辐射能力。但大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上海的外向功能总量达 152.499,远远高出其他城市,进一步凸显出上海在长三

角城市群的核心位置及龙头作用,是绝对的集聚和辐射中心。处于第二位的是杭州,外向功能总量为 20.401,主要由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房地产业拉动,处于第三位的是南京,主要凭借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优势地位。除此之外,外向功能总量较高的城市(以高于 10 作为依据)还有苏州、宁波、金华、台州、合肥,说明以上城市服务业较为发达,与外界联系紧密。而外向功能总量明显较低的城市(以低于 6 作为依据)有镇江、湖州、芜湖、马鞍山、铜陵、滁州、池州、宣城,大部分城市位于安徽省内,反映出这些城市的服务业发展相对迟缓,与外界联系不够紧密。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上海,城市流强度高达 4974.251 亿元,约是排名第二的苏州城市流强度的 2.4 倍,表现出最强的经济联系程度。第二层级的城市有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台州,这 9 个城市的城市流强度均超过 1500 亿元,南京、杭州分别作为江苏、浙江的省会城市,具有行政中心优势,其他城市县域经济较为发达,推动其形成较高的联系强度。第三层级(以 $1000 < F_i \leq 1500$ 为依据)的城市除第一、第二层级的城市及浙江的嘉兴、湖州、舟山外,包含了城市群涵盖的江苏、浙江省内的其他所有城市,江苏省内城市城市流强度明显高于浙江省内城市城市流强度。嘉兴、湖州、舟山与安徽省内除合肥外的 7 个城市处于第四层级。从城市流分层级的城市数量来看,处于第一、二层级的城市数量少,处于第三、四层级的城市数量多(表 2)。从城市流强度空间格局看,高强度城市的区位优势明显且本身发展较好,所以拥有较高强度的城市流。而处于第四层级的城市集中在安徽省内,主要在于安徽省内各城市虽然获得了一些政策性支持,但由于地理位置及前期发展基础不佳,相比上海与江苏、浙江下辖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明显落后,产业层次不高,受到外向功能总量大的城市辐射较少,整体城市流强度较低。从城市流倾向度来看,以 $K_i > 0.3$ 作为高城市流倾向度的依据,盐城、绍兴、金华、台州、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的城市流倾向度较高,集中在第四层级。由此可见,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整体外向联系具有明显的等级化差异,处于第三、四层级的城市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提升潜力。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与讨论

1. 2011-2016 年,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产值密度明显提高,空间分工水平提升,从主要分布在“沪苏锡”沿线地区扩展到“沪苏锡常宁(南京)”及“沪嘉杭”方向。空间演化效应开始显现,苏南、苏中、浙北地区具有明显优势,由此形成“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杭州-宁波-舟山”的“Z”形走廊地带的空间分布特征。

2. 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 23 个城市在 2011-2016 年间产业专业化系数提高,整体由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较低水平发展成为居中水平,说明服务业空间分工愈加明确。上海、南京、无锡、杭州、合肥等经济体量较大、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低,盐城、金华、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城市规模较小的城市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

3. 借助行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可以发现:在长三角城市群,有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将金融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业等作为优势行业,而只有少数城市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作为优势行业进行发展,存在一定的产业同构现象。此外,相比 2011 年,2016 年大部分城市服务业优势行业数量有所增长,服务业空间分工格局已经形成。

4. 城市外向功能和城市流强度依托于服务业,行业的外向功能量较高说明此行业发展较好,行业的外向功能量为 0 说明此行业发展较为滞后。表 1 得知各城市具有外向功能量的优势行业存在差异,间接反映出城市、行业间的空间分工状况。虽然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均存在外向功能,但差异明显,导致整体外向功能和城市流强度不高,降低了整体集聚辐射能力,各城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外向功能量较低,辐射能力较弱。

表 1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外向功能总量、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及倾向度 (2016)

	GDP (亿元)	外向功能 总量 E_i	功能效率 N_i (亿元/万人)	城市流强度 F_i (亿元)	城市流倾向 度) K_i
上海	28178.65	152.499	32.618	4974.251	0.177
南京	10503.02	16.980	91.842	1559.507	0.148
无锡	9210.02	7.521	227.016	1707.389	0.185
常州	5773.86	7.191	210.341	1512.514	0.262
苏州	15475.09	10.144	207.971	2109.698	0.136
南通	6768.2	9.316	178.017	1658.408	0.245
盐城	4576.08	9.635	142.690	1374.776	0.300
扬州	4449.38	6.121	171.394	1049.017	0.236
镇江	3833.84	5.440	200.935	1093.038	0.285
泰州	4101.78	6.534	164.598	1075.484	0.262
杭州	11313.72	20.401	78.924	1610.132	0.142
宁波	8686.49	13.464	146.459	1971.919	0.227
嘉兴	3862.11	7.220	136.230	983.535	0.255
湖州	2284.37	5.097	130.238	663.791	0.291
绍兴	4789.03	8.236	185.549	1528.256	0.319
金华	3684.94	11.178	116.797	1305.598	0.354
舟山	1241.2	6.451	44.583	287.621	0.232
台州	3898.66	11.998	125.804	1509.426	0.387
合肥	6274.38	10.361	101.329	1049.821	0.167
芜湖	2699.44	5.483	132.311	725.508	0.269
马鞍山	1493.76	3.667	145.329	532.955	0.357
铜陵	957.25	2.291	131.795	301.878	0.315
安庆	1531.18	6.618	81.580	539.881	0.353
滁州	1422.83	5.667	101.602	575.736	0.405
池州	589.02	2.503	84.290	210.981	0.358
宣城	1057.82	4.072	106.068	431.886	0.408

表 2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流强度层级划分情况 (2016 年)

层级	包含城市
一	上海
二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台州
三	盐城、扬州、镇江、泰州、金华、合肥
四	嘉兴、湖州、舟山、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二) 启示与对策

1. 在产业日趋细化的背景下,未来长三角城市群服务业空间分工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有必要继续发展特色优势行业,确定重点领域展开专项研发,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优化产业结构、确定新的培育方向、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13]。同时,地方利益导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是造成产业趋同的重要原因,长三角城市群应探索协同管理模式,加强城市间合作,在因地制宜基础上促进服务业合理化发展,避免服务业同构造成过度竞争,推动形成层次清晰的服务业经济带^[17]。

2. 充分利用上海在资金、人才、技术上的优势及上海自贸区的溢出效应,在市场集散、产业技术传递、综合服务、制度创新示范方面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借鉴;发挥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强度为第二层级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城市联动、产业互补、实现产业链与城市链有机结合^[18],从而促进城市群内部的合理分工和功能互补。

3. 牢牢把握长江流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机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优化升级符合比较优势的区域特色产业,利用天然的长江航道和发达的沿江综合运输体系对比较优势错位的产业实施产业转移^[19]。安徽被纳入城市群的大部分城市流强度均处在第四层级,要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主动承接江浙沪下辖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20],促进生产性、消费性服务业形成有效集聚,全面强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提高城市外向服务能力,推动区域服务业合理分工、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

4. 长三角城市群仅有上海、南京、泰州、宁波、舟山、合肥、芜湖 7 个城市将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作为优势行业,而交通运输设施的滞后在很大程度上会降低城市经济联系度,所以各城市有必要全面规划内外部交通线路,将联系紧密的城市进行串联^[21],加快综合客运、货运枢纽及各城市轨道交通网建设,逐渐形成都市圈同城化交通网体系;进一步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提升运输服务水平和能力,全面构建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和长江黄金水道为主通道的多层次综合交通网络^[18]。通过全方位经济联系网络的构建提升经济社会发展能级,进而利用经济联系方向和强度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政策,实现同层级、不同层级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22]。

参考文献:

[1] 吴建楠, 曹有挥, 程绍铂. 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特征与演变过程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2).

[2] 常瑞祥, 安树伟.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聚集与变化——基于 285 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产经评论, 2016, (6).

[3] Taylor P J, Derudder B, Hoyler M, et al.. New regional geographies of the world as practised by leading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firms in 2010[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3, 38 (3): 497-511.

[4] Wu J, Yang W, Qian S.. Impact of IT resources agglomeration to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siness service in metropolitan area-Taking Shanghai for example[C].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CMSE),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EEE, 2016: 262-267.

[5] 邱灵, 方创琳. 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综合测度[J]. 地理研究, 2013, (1).

[6] 席强敏, 李国平. 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及溢出效应[J]. 地理学报, 2015, (12).

[7] 孙克, 聂坚, 游细斌, 陈永林.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特征及空间效应分析[J]. 经济地理, 2018, (2).

[8]孙久文, 罗标强.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经济联系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 (8).

[9]翁媛媛, 高汝熹, 饶文军. 地区专业化与产业地理集中的比较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09, (4).

[10]Mulligan G F, Schmidt C..A note on loc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J].Growth and Change, 2005, 36 (4):565-576.

[11]蒋媛媛. 中国地区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1990-2007 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10).

[12]张祥, 杜德斌. 省际工业分工合作及其空间联系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5).

[13]王春萌, 谷人旭, 高士博, 许树辉. 长三角经济圈产业分工及经济合作潜力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6, (5).

[14]李慧玲, 戴宏伟. 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动态变化对比——基于城市流强度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 2016, (2).

[15]李颖. 沈阳都市圈生成与发育的实证研究[D].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 2003.

[16]赵伟, 余峥. 中国城市群集聚辐射效应测度[J]. 城市问题, 2017, (10).

[17]黄盼. 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高新技术产业同构化的关系研究[D].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7.

[18]王春萌. 空间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9]蔡淑兵, 陈明华, 朱勤. 长江流域区域发展差异性对开发与保护的要求[J]. 人民长江, 2013, (13).

[20]崔大树, 杨永亮. 长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异机理研究[J]. 经济师, 2016, (1).

[21]郭卫东, 钟业喜, 傅钰. 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结构及其效率[J]. 企业经济, 2018, (1).

[22]孙斌栋, 丁嵩.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J]. 地理研究, 2016, (9).